

鲜卑民族金饰物所反映的域外文化因素

傅 宁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 要:鲜卑民族的人主中原,为中原地区带来了更为便利的民族融合浪潮,西方文化因素也顺势传入了中原地区。以黄金作为装饰物,是欧亚大陆草原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在装饰上的一个共同特征。鲜卑民族亦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创新。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族属鲜卑的金饰物中,既有北方地区流行的以动物造型及纹饰题材的特点,也可见因东西文化交流而导致的这些装饰品发生的明显变异和发展。

关键词:鲜卑;金饰物;域外文化因素

分类号:K84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6)06-0017-05

鲜卑民族是融合了匈奴、丁零、柔然以及部分汉族流民在内的北方游牧民族,其兴起、南下并入主中原的最直接后果,导致了历史上又一次极为重要的时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社会大转轨时期的到来,对中国古代文明史可谓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传统上与欧亚大陆草原东西方有着频繁交往和密切接触的北方游牧民族的人主中原,不仅带来了其自身极富生气、极其活跃的文化品质,为中原民族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命,而且更带来了欧亚大陆草原民族文化的各种信息,从而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考古发现中屡见不鲜的、具有域外文化因素的各种文物,正是在当时所谓的“胡乱华”代背景下,东西文化交流与交往的真实写照。

以黄金作为装饰物,历来就是草原游牧民族的喜好,也是欧亚大陆草原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在装饰上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从西方的斯基泰和东方的匈奴等游牧民族饰物中即可窥见一斑。尤其是在游牧民族兴起的早期阶段,更多见以这种贵金属为原料制成的装饰物,而相对少见黄金质的盛储用器具。这一文化现象可能与象征财富的贵金属较少以及草原民族的喜好

有关,也有可能是便于迁徙的因素使然。鲜卑民族亦继承了这一传统并有所创新。在中国北方地区发现的鲜卑民族金饰物中,既有北方地区流行的以动物为造型及纹饰题材的特点,如头饰、耳饰、项饰、饰牌以及带具等,也可见因东西文化交流而导致的这些装饰品发生的明显变异和发展。

一、带有活动摇叶的金饰物

《晋书·慕容廆载记》中说:“护跋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地。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步摇”^[1](卷108)]。由此可知,慕容鲜卑所着之步摇冠,当是借鉴邻近民族冠饰而来的。乌桓妇女“髻着名决,饰以金碧,犹中国巾帼、步摇”^[2](卷90)]。可知乌桓妇女所戴步摇同中原妇女一样是着于巾帼之上的。至于以“髡头为轻便”的乌桓男子戴不戴步摇冠不得而知。而身为男性的莫护跋“敛发袭冠”,可知慕容鲜卑男性亦使用步摇冠。在中国史籍中有关步摇冠的记载,当首见于《汉书·舆服志》。其中描

收稿日期:2006-05-18

作者简介:傅 宁(1962-),男,福建省福州市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博士生;内蒙古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述皇后谒庙时所戴的礼冠形制为“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八爵九华,熊、虎、赤黑、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2](卷30)}六种瑞兽饰于其上,但惜未见实物。魏·曹植诗云:“戴金摇之熠烁,扬翠羽之双翘”^[3]。晋·傅玄《艳歌行》中亦有“头安金步摇,耳系明月珰”^[4]的记述。而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更绘出了头着步摇冠的妇女形象。此图虽为宋人所摹,但亦可佐证步摇冠的一种戴法是两只相同的头饰直接插饰于发中。但从图中来看,这种步摇似乎只是枝脉可以摇动,有别于考古发现中鲜卑民族所戴的装有活动叶片的步摇冠。从目前中国考古发现来看,这种“步则摇动,行则有声”的步摇冠,多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境内,与鲜卑民族的活动区域相吻合。由此可见,东汉以来直至魏晋南北朝,带有活动叶片的步摇冠一直是北方地区较为流行的、且为鲜卑民族所喜用的一种冠饰。

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西河子乡的一处窖藏中,出土了四件两两相同的步摇冠,被命名为马头鹿角金冠饰和牛头鹿角金冠饰,时代定为北朝时期^[5]。但从其造型、工艺及时代特征、出土地点等因素考虑,所定时代似显稍晚,而更可能是东汉末到魏晋时期的产品^①。从两种造型不同的动物形象上分析,一件面部瘦长,吻部无明显外凸,枝角亦相对窄长;另一件面部稍宽,吻部两侧外凸呈半圆形,头部枝角亦显宽大。故原报告中方有马头、牛头之称。两动物面部均以汉晋以来广为流行的金银器粟珠工艺,来表现动物的眼、嘴、鼻、耳等部位。面部瘦长者甚至在其枝角部也有用粟珠表现出来的纹饰。桃形叶片的周缘还冲出点状联珠纹。两型步摇冠的动物面部均镶嵌有水滴形宝石,其中面部瘦长者更在枝角处镶嵌此类装饰物,制作十分精美。从上述两套四件步摇冠基座的动物面部及角部特征来看,显然非牛非马,其形象更应该属于鹿科动物,即生息于森林之中、又为森林民族所熟知的马鹿和麋鹿属。这或许是源于森林的鲜卑民族,在“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导引下,走出森林进入草原的一种原始追忆,也有可能是以鹿为图腾崇拜的反映。而发端于中亚、西亚地区的粟珠工艺以及欧亚草原地带广为流行的水滴形镶嵌技法,应为鲜卑民族的继承或借鉴。除此之外,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毛力吐墓葬中,也曾出土了一件金步摇冠^②。

其造型为一立于圆片形基座上的鸟,在鸟羽和鸟尾上垂挂可活动的圆形金叶片。圆形基座上有四针孔,显系缝制于巾帛之上的步摇冠形式,时代被定于东汉早期。

在辽宁省境内亦发现了数件金步摇冠。如北票房身村2号前燕墓中出土的两件大小不一的金步摇冠^[6],基座为长方形透雕博山形,其上分别有12根和16根垂挂有可活动金叶片的枝条;辽宁省朝阳市田草沟也发现了两件造型与房身村2号墓出土者几近一致的金步摇冠^[7]。此外,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也出土了一件有片形摇叶的金步摇冠^[8]。与上述几例步摇冠有别的是,冯墓出土的步摇冠是以两窄条金片弯成相交的弧状十字形,在交叉处以铆钉依次与上面的空体扁球和仰钵形基座相连,其上再装饰6条枝脉,每条上环接3枚金片,由此构成冠笼上之步摇冠形制。

上述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和辽宁省境内的鲜卑步摇冠,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制:一为冠笼或着于巾帛上的步摇冠,另一种为直接插饰于头发中的两只对称状的步摇冠。二者共同之处即均垂挂有可活动的金叶片。

除装有活动摇叶的金步摇冠以外,族属鲜卑并饰有摇叶的金饰物还见于耳饰、带饰及马饰具上。如吉林省榆树老河深出土的带有活动摇叶的金耳饰^[9]、前述的辽宁省北票房身村2号墓出土的饰有活动摇叶的方形带铐以及河南安阳孝民屯154号前燕墓出土的带有活动叶片的马当卢^[10]等。

在中国境外发现的、垂挂有活动摇叶的金冠,最早的要数1864年出土于顿河下游新切尔卡斯卡的萨马尔泰女王墓中的金冠,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11]萨马尔泰即我国史书中所称的“奄蔡”。《史记·大宛列传》载:“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行国,与康居同俗”。在这件残损的金冠冠带上方的两株树上,装有写实性的、可以摇动的金树叶。树下为两只鹿和一只大角羊,其后各有两只鸟,这是典型的萨马尔泰装饰风格。冠带正面装饰椭圆形水晶、珍珠及石榴石雕琢而成的女神像,显系希腊艺术的特征。

另一次轰动世界的考古发掘,是1979年由前苏联学者维克多·沙里阿尼迪主持的对阿富汗席巴尔罕“黄金之丘”的发掘^③。在这6座与西迁大月氏有着密切关系的墓葬中,共出土了两万余件

黄金饰品,时代被定为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之间。这批金饰品的出土,对我们研究和认识中亚,特别是古代大夏、大月氏和贵霜王朝的历史、文化和民族起源,以及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等,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这批为数众多的金饰品中,既有欧亚草原以野兽搏斗为题材的图案纹饰,也有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的装饰题材,还有源自中国的铜镜等等。希腊的故事、希腊的服装却配合着草原牧人的宽面庞;希腊神话中的怪兽与草原地区的马和羊搏斗在一起;几乎所有饰物上的松石镶嵌物均做成泪滴状。吴焯先生研究认为:“金丘山墓葬的金制品和我国魏晋以后的金属工艺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在篆刻方法上,有某种程度的借鉴”^[12]。其中6号墓中出土了一件满饰活动叶片的金步摇冠,在冠的正面为五簇树木,其上缀满金摇叶。树木的旁边装饰有八只鸟,与《续汉书·舆服志》中所载的步摇上有“八爵(雀)九华”之制相吻合。4号墓中还出土了一件枝条盘绕、上缀活动金叶的步摇冠,在细枝上还串有圆珠,也与《续汉书·舆服志》记载的步摇“贯白珠”的做法一致。而在装饰有人物及动物纹的金耳坠上,也垂挂着圆形的金叶片。席巴尔罕黄金冢的发掘,对我们研究东西文化交流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而其中出土的带有活动叶片的金步摇冠,可能就是汉魏以来中国北方地区步摇冠流行的直接祖源。否则,这种装饰品的突兀出现便无从解释,而其中欧亚草原游牧民族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汉魏以来装有活动叶片的金饰物,除上述的金步摇冠、耳坠、马具和带具以外,还见于服装上的饰物。在公元1——3世纪的安息雕刻像上,我们也发现了缀于身上的叶形片。如在伊朗塔克伊布斯坦石窟中的国王像上,其衣服、尖顶帽上均缀有摇叶和叶形片。哈特拉发现的安息国王身上也装饰着叶形片。这种装饰方法在南北朝时期已传入我国后,在山西太原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公元570年)娄睿墓中的骑马陶俑上即可见到^[13]。此外,2001年,笔者在法国参加了由西班牙、法国、俄罗斯、蒙古和内蒙古博物馆共同举办的“从亚力山大到成吉思汗”展览。其中一套由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传出土于中国北方的金饰物十分引人注目^④。这套以黄金制成的服饰包括带有活动叶片的服装饰件、镶嵌珠宝的风纹金冠饰、弯月形金

镶宝石项饰、龙纹金带饰及一块方形金饰片。原定其时代为公元6——8世纪,为族属突厥民族的金饰物。但从装有活动扣舌的金带具,以及篆刻出着鲜卑帽的骑马人物金饰片来看,将其时代和族属定为南北朝时期鲜卑人的饰物似更为准确。其中,装有可活动叶片的服饰有两式。一为近似桃形、背面内凹的饰物,可能用于人之肩部或胸部;另一式为长短不一的长条形,可能装饰于衣服的边缘。金冠顶呈覆钵形,两端伸出长方形双系。其端部以合页与穿缀于长条形冠带上的倒“丫”字型金片穿接,冠带上锤鍍有坐式乐伎15人。倒“丫”字型金片及冠上均镶嵌有圆形、菱形和水滴形宝石,冠顶上凸雕凤纹。所有图案及宝石边缘均饰有粟珠纹。此外,弯月形项饰上也镶嵌有与冠顶上形制相同的宝石。此种形制的金冠目前还较为少见,但其造型却与山西大同南郊北魏107号墓中出土的一件被认为是下颌托的铜头饰几近一致。而且,弯月形项饰也大体相同^[14]。但上述制作精美的金冠饰似不大可能是防止头骨散落的下颌托。

以金片装饰冠服的做法是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民族由来已久的习俗。从公元前6世纪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用金片装饰冠服的实物,常见于各地区发现的墓葬中。不同的是自东汉以来,以活动叶片作为冠服饰物的做法才流行起来。但这种装饰习俗无疑应源于鲜卑民族兴起以前的欧亚大陆草原游牧民族。如乌克兰境内黑海北岸 Tat' jani-na Mogila 发现的公元前4世纪的一顶装饰华丽的帽子和一件缝缀有人面纹、狮纹及三角纹金片的尖顶帽^[15],二者均为斯基泰人的冠服式样。此外,在欧亚大陆草原诸游牧民族活动区域里,还有许多不同纹饰或造型的小金片出土,这些金片极有可能是冠服上的饰片,其边缘上的穿缀孔向我们说明了它们的使用方法。如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墓葬中出土的公元前5——前4世纪满饰四千余件金饰片的塞种王服饰^[15]、绝大多数是缝缀于腰以上部位的阿富汗席巴尔罕1、2号墓中出土的为数众多的金饰片^[15]等等。除境外发现的用于冠服上的金饰片以外,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阿鲁柴登、西沟畔战国匈奴墓中,常见有周边留有缀孔的虎、怪兽、天鹅、鹰、马等金饰片^[16](351,380),它们也可能是缝缀在冠服上的饰物。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西沟畔出土的饰有金片的西

汉时期匈奴贵妇冠帽,亦向我们证明了这些装饰物的使用方法。^{[16](344)}

二、金龙项饰和双兽人物纹饰牌

1981年,在内蒙古包头市西河子乡窖藏中,与金步摇冠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以金丝编制而成的、饰有钺、盾、戟、戈和两件梳栉模型的金龙形项链。此种型制的项链在我国较为少见,而在欧亚大陆草原西部却时有发现,只是两端为马头、龙头或金链两端直接扣结起来使用的区别。如印度北部塔克西拉出土的石雕像,即有佩戴各饰项链的例证^{[17](224)};日本出版的古代埃及文明展览图录中,也收录有一件两端饰有蛇头的金项链^⑤。孙机先生对国内外发现的兽头金项链作了极为精辟的考证,认为这种饰物是受到佛教影响、并通过北方草原之路传入我国的一种项饰^{[13](107)}。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即此时期习用一种人与双兽构图的金饰牌。1990年,在通辽市科左中旗腰林毛都苏木北哈拉吐出土的一件双狮人物纹金饰牌^[18],时代为东汉晚期。此件金饰牌为铸造而成,所饰人物为高鼻深目的胡人,其身旁两侧各有一双头相向的长鬃雄狮,整体为胡人驯狮的构图题材。1956年,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凉城县小坝子滩出土了一件四兽人物纹金饰牌^{[16](92)}。此枚金饰牌也系铸造而成,四兽两两呈反向排列。兽张口,颈部有鬃毛,上端中央有一左右手分执兽颈的人物,其造型亦应属于上述胡人驯狮纹金饰牌的构图形式。此外,1981年,在宁夏固原雷祖庙村北魏墓中,出土了一件青铜饰牌和一件青铜铺首^{[19](图版68,69)}。二者主题纹饰均为双龙与人物,且人物居于双龙之间。而在阿富汗席巴尔罕出土的两件金耳饰上,我们也见到了这种构图方式。如2号墓中出土的两件金耳饰,其中一件的纹饰为相向的对马形龙,龙呈后肢反转的姿势,龙身上镶嵌有水滴形松石。中间人物为宽脸庞、高颧骨、斜吊眼的草原游牧人形象,额部饰一点状纹。另一件金耳饰上的人物着希腊式服装,两侧各有一倒置的龙首鱼身、近似摩羯的怪兽^⑥。笔者也在多年的文物工作中,见到过一些流散于民间的、相近构图形式的青铜饰牌。此类饰牌的出现,当也是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从上述出土于欧亚大陆草原东西方金饰物的对比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此时期的金饰物具有了明显的域外文化特征。当然,这种文化的借鉴和吸收既是对前代北方民族文化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又是当时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所致。《魏书》中“大月氏国,……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自此中国琉璃遂贱,国人不复珍之”^[20]的记载,前燕冯素弗墓出土的鸭形玻璃器、山西大同出土的各种形制的玻璃制品^[21]以及由外域舶来的各式金属器具^[22]等,亦可佐证当时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繁盛。

鲜卑民族是兴起于中国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极强的文化包容力,使之更益于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东西文化的交往,在欧亚大陆草原生业形态相同或相近的民族中,历来就是频繁进行着的。鲜卑民族入主中原,为中原地区带来了更为便利的民族融合浪潮,西方文化因素也顺势传入了中原地区。广泛的“胡化”现象,正是当时融合有欧亚大陆草原文化的北方民族文化进入中原汉文化区域的表现。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言:“‘五胡’不是野蛮人,是牧人。他们带来的有战乱,但不止是战乱,还有北方民族的充满活力的气质和气魄。”^[23]而正是这种气质和气魄,使中华民族文明得以增添新鲜血液,并向更深、更广的领域发展。也正是这种气质和气魄,使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交往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并为隋唐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并达到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释:

①赵雅新《科左后旗毛力吐鲜卑金凤步摇冠》,哲盟博物馆馆刊,1996(内部),P26-28。

②2000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韩伟先生来内蒙古考察,笔者曾就此征询过先生的意见,认为金步摇冠的时代应定在东汉末为宜。

③⑥关于席巴尔罕遗宝的资料至今尚未见有深入研究的报告。1979年2月,美国《时代》杂志发表了一篇报道。1980年,前苏联学者维克多·沙里阿尼迪发表在美国考古期刊和1980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快报等杂志上所见三篇报告。本文涉及文物均来自日本学者1981年在阿富汗工作时拍摄的部分文物。

④内蒙古博物馆、法国集美博物馆等《从亚力山大到成吉思汗》,展览图录,图版153,2000年,西班牙。

⑤(日)东映株式会社《古代ユヅプロト展》,图版106,2005年。

参考文献:

- [1]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曹植.七启[A].艺文类聚[C].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傅玄.艳歌行[A].玉台新咏[C].北京:中华书局,1965.
[5]陆思贤、陈棠栋.达茂旗出土的古代北方民族金饰件[J].文物,1984,(1):81-83.
[6]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J].考古,1960,(1):24-26.
[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博物馆等.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J].文物,1990,(2):33-41.
[8]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文物,1973,(1):2-19.
[9]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M].文物出版社,1987.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J].考古,1983,(6):501-511.
[11]M·I·Roslovitzff. Iranians and Greeks in South Russia[M]. oxford,1922.
[12]吴焯.阿富汗西伯尔罕墓葬文化,草原丝绸之路

与中亚文明[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

[13]孙机.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文化交流中的若干问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14]王银田,王雁卿.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M107 发掘报告[R].北朝研究:第1辑[C].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15]张文玲.古代草原世界的贵族服饰[J].故宫文物月刊(第18卷第9期总213期)P4-11.

[16]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7]约翰·马歇尔著.塔克西拉Ⅲ[M].秦立彦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

[18]上海博物馆.草原瑰宝——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品[M].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19]宁夏固原博物馆编.固原历史文物[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20](北齐)魏收.魏书[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21]尹刚.北魏平城的玻璃器[N].中国文物报,2005-05-05.

[22]山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编.山西文物选粹[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23]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M].香港:商务出版社(香港)有限公司出版,1997.

【责任编辑 于默颖】

Gold Ornaments of Xianbei People Reflecting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

FU Ning

(College of Mongolian Studies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China)

Abstract: The moving of the Xianbei people into the Central Plain area had promoted the merging of different ethnic cultures in the reg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brought Western cultural elements into China.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from the Eurasia steppe shared a common custom of making and wearing gold ornaments. The Xianbei also inherited this cultural tradition and brought forth their own innovative ideas in the creation of gold ornaments. Although most of the gold relics of the Xianbei people unearthed in the northern parts of China were animal-shaped or of engraved patterns, which were native to northern China, there were evident variations and developments in ornament patterns that resulted from East-West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Xianbei; gold ornaments;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